

日本地区研究的论争与发展

初晓波

内容提要 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的发展经历黄金时期,在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社会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为日本更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地区研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关于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专业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之间关系、地区研究方法论及地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等三个方面的论争。这些学术论争推动了日本地区研究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当前,日本的地区研究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国家政策走向关系日益密切,其地区研究理论建设尤其是方法论方面不断完善,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得到不断加强。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地区研究 日本 国际关系研究 学术论争

《日本国际政治学》系列丛书的第三卷《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日文版是在2009年2月正式出版,实际上书后罗列的日文和中文参考文献截止出版时

* 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间是2008年,英文参考文献仅到2007年,距今已有10年。回顾该书成书后十年日本地区研究发展新的现状和动向,是评价、补充国分良成等各位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因此,本文重点介绍书中涉猎不多的日本地区研究中的论争过程,总结和分析日本地区研究新发展的特点及其走向。由于我国学界对日本地区总体研究情况的介绍反思并不常见,^①希望本文的若干总结能为中国的地区研究提供参考。

一、日本地区研究的全面总结认识

国分良成教授在该书的序章《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中,对世界范围内地区研究的概念与轨迹,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发展及日本所受到的重要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书中提及了日本地区研究在日本学术会议中确保拥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地位,成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自主领域之一。但由于时间上的关系,国分教授并未看到2008年8月28日日本学术会议地区研究委员会下属的地区研究基础发展小组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重要报告《加强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研究》。参加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学者都是日本地区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部分学者正是该书的撰稿人和组织者,如担任委员会委员长的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亚非地区研究科小杉泰教授,负责该书第七章《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与宗教》;担任委员会干事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地区研究科的酒井启子教授(现任千叶大学教授),是该书的主编之一,负责第六章《中东的国际政治:由他者决定的地区与冲突》;同样担任委员会干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武内进一首席研究员,负责该书第二章《冲突的理论与现实:从地区角度对武装冲突的观察》。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委员会各位学者之间头脑风暴的结果,而且进行了前后两年时间的周密调查,对全日本与地区委员会相关的59

^① 对日本地区研究进行总体归纳总结的中文专著尚未出现。研究论文多为对日本某一地区研究领域的总结,如董顺肇:《“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日本构建中国研究的网络》,《未来与发展》2017年第9期,第43—47页;姚传德:《日本的东北亚研究》,《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4期,第53—57页;阎德学:《“日本斯拉夫·欧亚学”的构建与意义》,《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8—138页;吴光辉、王增芳:《日本的东南亚研究的最新动态:以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89—93页;以及对日本地区研究进行评介的文章如朱佩禧:《他者瞳孔中的自我:评〈日本“帝国”的学知:地域研究下的亚洲〉》,《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第149—152页。

个学会,并对83个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发放问卷,取得了宝贵的一手数据。

国分教授在该书中对地区研究有一个极其简约的定义,“发现并解析世界各地个性的知识探求”。^①《加强全球化时代的地区研究》中的定义更为丰满一些,“地区研究是研究构成地球社会的各个地区,旨在综合把握其固有属性及特点,以更好理解地球社会多样形式的专业性学问领域”。^②报告强调,地区研究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代世界里,不但对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跨领域、学科融合与跨学科的研究,可以超越现代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与过分细化,推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收获真知灼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地区研究的热潮及战后日本迫切希望重新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意愿,造就了日本地区研究的黄金时期,大量地区研究机构和地区研究杂志纷纷创立,日本学者出现在世界各地进行田野工作并推出了大批的经典地区研究作品。当然,与美国注重学科和理论方法研究相比,日本传统学术风格中的专注精细、强调实证的风格对其地区研究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因越战陷入低迷,日本经济实力则不断增长,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国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频次迅速增加、在日本外国人数量稳步上升等因素,为日本地区研究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日本政府早在1963年,就在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中首设“特定研究”,指定为亚洲非洲的地区研究。经过30多年的努力,日本地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达到国际上较高的水准。

21世纪以来,文部科学省的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敏锐地发现,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地区问题,需要各个不同学科进行协调整合并形成联动机制。同时,全国范围内从事地区研究的各个机构需要形成一体化的网络,进行文献与数据库的共建共享,在不断提高国民对世界认知的同时,为国家政策建言献策。在很短时间内,日本地区研究共同体、地区研究学会联

①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分良成、酒井启子、远藤贡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 第三卷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刘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② 日本学术会议:『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における地域研究の強化へ向けて』,平成20年(2008年)8月28日、1頁,<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0-h62-2.pdf>,2018-09-26。

络协议会成立,学术信息网络迅速铺开。2003年,京都大学开始授予“地区研究”的博士学位,为年轻一代地区研究学者的培养提供了广阔天地。日本学术会议首次设置了地区研究专业委员会,下面包括人文经济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地区发展学及地区信息学等小组委员会。可以说,日本的地区研究获得了宝贵的政策支持、学科发展空间、优秀人才培养及稳定的财政支持。从日本学术振兴会最近十年来支持的地区研究科研项目统计(参见下表)数字来看,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年度变化,但总体来看,其规模相当可观,如果与同期其他领域情况相比,被归入综合人文社会领域的日本地区研究获得经费的总额,不仅远超同一领域内的资源保护研究、性别研究,甚至在很多年份都超过了人文学领域的哲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政治学。

表 日本学术振兴会中地区相关研究科研项目情况统计一览表(2007—2017)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申请数(件)	423	421	335	309	360	344	398.5	412	449	500	462
批准数(件)	211	215	88	75	114	95	120.5	113.5	128.5	144.5	140.5
课题直接经费总额(万日元)	70688	66130	28869	22752	33480	22630	30430	24820	25125	35650	27155
课题平均直接经费(万日元)	335	307.6	328.1	303.4	293.7	238.2	252.5	218.7	195.5	246.7	193.3

资料来源:详见日本学术振兴会网站中历年公布的不同领域科研经费数字,笔者总结归纳而成,参见 http://www.jsps.go.jp/j-grantsinaid/27_kdata/index.html, 2018-09-28。

当然,评价日本地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成果,不能忽视日本地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从事地区研究学者的特点。1963年,日本国内展开对地区研究大讨论时候的代表性学者、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本冈武教授,在考察美国、欧洲的地区研究后,结合日本自身的状况,提出地区研究的几个特点:(1)研究与教学组织上的一体化;(2)建立跨专业领域的综合研究组织;(3)重视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研究;(4)强调研究对象国语言的教育;(5)尊重各专业学科基础理论的训练;(6)现场调查的必要性;(7)对象国各领域完整资料的

搜集利用。^①直到今天,这些特点仍非常明显。日本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半数以上都是从事非地区研究的专业,分属于不同院系,一般都有自己所属专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为日本地区研究范围的拓展与深度的挖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同时,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的研究人员所占比例很高,这为地区研究知识的积累、传承、影响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舞台。京都大学地区研究综合信息中心的数据库建设就非常典型。该中心在2006年正式创立,以京都大学原有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亚非地区研究科为基础,以实现“地区研究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及“推进地区关联性研究”为目标,将此前各研究机构和学者长期分散保存的与地区研究密切相关的文字、画像、动画、声音等大量资料进行电子化处理,同时与国内外各地区研究机构合作,尝试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地区研究资源共享数据库”。目前,该中心已经实现了51个数据库的资料共享,其中既有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等东方国家的古代文书,也包括西方如英国的议会记录;既包括日本研究东南亚第一人、精通八种外语的石井米雄大量的私人收藏,甚至还有非常珍贵的1938—1944年《北京特别市公署市政公报》目录检索数据库,以及东亚地区战前明信片的数据库。^②

2010年4月5日,日本学术会议地区研究愿景小组委员会发表了《地区研究领域的愿景》,其中全面总结了日本地区研究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对日本社会贡献的层面来看,日本的地区研究增加了日本对国际社会的理解,推动日本多文化共生的发展,为地区的多样性及地区建设、地区政策制定提供方案,对地区信息的收集整理及共享着力甚多,强化了日本的地区教育等等。从对国际社会贡献的层面来看,日本的地区研究为世界文化遗产及历史资料保存提供了帮助,推动了相关国际冲突研究与灾害复兴研究,为国际发展合作做出了日本的贡献,推动了可持续性发展及地区文化多样性与共存的理念普及与客

① 本岡武:“地域研究とはなにか”、『東南アジア研究』11(1)、1963年、第10—17頁。国分良成在《序章》中认为,本岡武近乎忠实地照搬美国地区研究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本岡武这篇文章作为介绍美国地区研究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学界影响,但他非常清晰认识到,即便在美国,不同大学的地区研究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汲取美国地区研究的经验教训,日本的地区研究必须要与自身的学术传统及优势相结合,有非常清晰的本土化意识。这一认知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② 谷川竜一、山本博之:『地域研究データベース—つながる地域、はぐくむ叡智—』京都大学地域研究統合情報センター、2013年。由于相关数据库在不断更新,更新情况参见京都大学地区研究综合信息中心网页:<http://www.cias.kyoto-u.ac.jp/database/#cat2>, 2018-09-22。

观实践。^①当然,该报告在地区研究的概念使用、脱“西方中心论”努力,以及实现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联动机制”等方面也提出了若干期待。

二、日本地区研究中持续不断的论争

地区研究从产生以后,其跨学科的特点就面临与强调理论严整和学科规范的现代学科体系之间的摩擦。地区研究强调的是研究对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个性或者独特性,为质疑、打破众多普遍性理论提供样本;而普遍性理论归纳恰恰是所有现代学科赖以存在的前提,换句话说,就是从众多个性中去寻求共性的努力。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日本学术界也不例外,引发了持久的论争。

上文提及的本冈武在《何为地区研究?》一文中,除向日本学界介绍美国地区研究的现状,同时也提到了日本地区研究面临的方法论之争。1958年,丸山真男在评价贝拉的《德川时代的宗教》一书时,提出了美国学者在研究日本或者亚洲时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以历史学家或者地区研究的专家为代表,“在尽可能广泛涉猎有关研究对象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对象主义方式来阐明制度及文化,不太关注作为分析工具的范畴和其相互关系的精确化。在这一研究动向中,往往存在一种暗示的前提,即政治、法制、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相关,其领域内诸多构成要素的相关性及其动态作为客观的前提条件内在于所谓对象本身之中。”同时还存在着第二种动向即所谓“方法主义”,“在这里,历史的实体一旦在其自身的统一性遭到解体从而依据方法上的框架来分析各要素间的相关意义之后,它便会重新与历史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在诸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那种基本概念的框架迄今已高度精确严密化的领域中,人们想探究在理论上构筑的各种各样的假说以全然不同于美国的文化为素材,在多大程度上经得住检验”。^②丸山认为,师

① 日本学术会议:『地域研究分野の展望』、平成22年(2010年)4月5日, [www. scj. go. jp/ja/info/kohyo/pdf/kohyo-21-h-1-7. pdf](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1-h-1-7.pdf), 2018-09-26。

② 这篇书评最早于1958年发表在《国家学会杂志》第72卷第4期,引起了广泛反响,贝拉本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回应,后收入《丸山真男集》第七卷。中文翻译引自贝拉一书的中文译本附录〔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9—260页。

从伯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的本尼迪克特和师从帕森斯主攻社会学的贝拉,本质上都属于第二类学者。对象主义研究的评价标准是对象本身研究的准确性,而对方法主义研究的评价,对象本身研究准确性仅仅是加法,研究框架、理论周全则是乘法。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用一种普遍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特殊个案,尤其是跨文化研究中,基本概念是否能够通用?理论逻辑在现实中是否必然?方法主义学者选取了有利于自己的个案,是否忽略了不利于理论验证的相反个案?丸山真男质疑将基于欧美社会基本逻辑建立起的理论框架套用于非西方社会,实际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地区研究核心论争与其说体现在方法论上,不如说是体现在学科分野上。地区研究的本质属于国际问题研究,因此,在大学设置地区研究机构无法独立的背景下,大都选择附着于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专业。后者理论先行的惯例与地区研究强调个性事实的思维存在隐性对立,而公开论战使这一矛盾显性化。时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从事中国研究的冈部达味,1989年12月在日本政经学会大会上发言说:“众所周知,把西欧的理论框架原封不动拿过来用于解释亚洲是行不通的。不仅是亚洲研究者,所有的地区研究者,都要从既有的分析框架(事实上的确是更多源于欧美)得到启示,或者认真下功夫研究其来源与成因并使用它,毕竟没有理论和概念框架是无法从事学术研究的,地区研究者正处在框架研究的第一线。我们一直见证着那些看起来非常精致的理论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①他在《国际政治分析框架》中更为直截了当,强调地区研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没有地区研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学者,除非是具备特殊的才能,否则恐怕只能是‘进口商’”。^②

冷战结束后,大量全球性问题开始浮上水面,此前被忽略的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问题、跨境环境污染、互联网安全与保护、太空军备竞赛等引发了各国学者的关注。而这些问题的专业性及涉及的地理范围不断拓展,不是一个地区研究的学者可以单独完成分析的。国际关系领域内从事理论性研究、跨区域全球性议题研究及国际法与国际规范的学者大显身手,地

① 冈部达味:“はじめに”、『アジア研究』36(3)、1990年、4—5頁。

② 冈部达味:『国際政治の分析枠組』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Ⅱ頁。中文版译文参见〔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国际政治学 第三卷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第11页注释3。

区研究则饱受质疑。日本地区研究本身所固有的一些弱点也显露出来,如关于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研究无论是学者人数还是议题都占据绝对优势;关注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着力较多,面对现实政治经济巨变时不能及时发声;地区研究中研究对象和领域过分细化后,对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方法储备等等……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的平野健一郎教授甚至认为,地区研究学者长期以来享受的“沉溺于特定地区研究的欢愉”“迷恋于研究对象的快乐”等特权正在丧失,追求全局性、多层次、跨境性国际社会结构为地区研究开辟了从个别性向普遍性发展的道路。^①

近20年来日本关于地区研究的论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地区研究中“地区”概念产生了质疑。曾经在日本地区研究繁盛时期做出巨大贡献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矢野畅教授很早就指出,“‘地区’从概念上说属于认知概念(perceptual concept),也就是说,其具体定义会伴随着认知主体的利害关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②身兼国际关系研究和地区研究的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教授也冷静地意识到,“毫无疑问,地区研究是以秉承特定价值观进行自由而科学的现场研究为根本的。但现实问题是,地区的‘区域’划定,不可否认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种种改变,受到各种价值观、政治意识的左右”。^③浜下武志则更详细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概念与地区研究的崭新挑战。传统国际社会以国民国家为中心,向下继续细分可以有地区,最小的单位是地方,而向上则有区域,最大的则是世界。全球化时代是以地区为中心,国家细分后的地区,除了保持传统上作为国家和地方之间的中间环节外,还直接面对区域甚至世界。比如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就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而联合国参与的很多维和地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家管辖,变成了具有世界性的问题。同时,发达国家中的地方自治体与非政府组织自主性日益凸显,都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地区传统研究的疆域划分标准。传统地区研究主要是着眼于陆地的划分,海洋视角下的地区研究如何界定?再比如

① 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 第三卷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第15页。平野对地区研究面临困境的完整思考以及解决方法参见他的讨论会发言,平野健一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2006年2月24日大阪大学,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note/060224ft_hirano.htm,2018-10-06。

② 矢野暢編:「講座 現代の地域研究 1 地域研究の手法」弘文堂、1993年、9頁。

③ 宇野重昭:「多元的地域研究から超域研究をめざして」、『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0号、2011年、5頁。

说,以华侨问题研究为例,地区划定与特定学问之间如何发生关联?地区的多样性与地区的多层性、地区网络的形成以及地区身份的追求等等新视点,都需要地区研究学者给出答案。^①

第二种论争来自于对地区研究的基础,也就是地区研究本质上属于个案研究的质疑。地区研究者不断追求对对象地区的个性研究更加周密,更加清晰,但“个案研究如果不能提炼出一般性结论,那么就仅仅属于对个别琐碎现象的描述,而不可能还原到人类社会普遍性规律的高度”。^②这样的地区研究就变成了研究者的自娱自乐。早稻田大学是日本地区研究的重镇,是“亚洲学”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时任早大亚洲研究机构教授的寺田贵在研究亚洲地区主义时首先强调,自己的研究始终秉承的是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下对亚洲地区整合进行的实证考察,他意识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关系地区主义研究主要成果来自于区域合作最为成功的西欧和北美,随之产生的很多概念和框架都无法直接用于亚洲地区合作的研究,需要进行理论上的修正和补充。“我不把自己的研究与到现在为止世界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发展起来的地区主义与地区整合研究对立起来,而是期待自己的研究能够沿袭这种国际上发展的脉络,希望做出哪怕一点点的贡献。也就是说,自己的研究要避免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孤立状态,通过与其他类似研究进行包括论争在内的对话,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为此,和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有共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以及‘共同语言’是不可或缺的条件。”^③很显然,寺田贵清楚意识到存在地区主义研究可能被混同于地区研究的误区,才做出这样的声明。

东京大学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山影进教授不仅指出了地区研究与地区主义中两个“地区”的英文词并不一致,而且更进一步提出,希望从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的研究出发,重新反思地区研究的若干努力:如所谓的“地区”,并不应该是研究者头脑中主观界定的,而应该是与这一地区主体性相关的人们头脑中的认知有关,是对经过共同身份相互确认后人们的地区问题;地区仅仅是一个

① 濱下武志:「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課題」、『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0号、2011年、17—29頁。

② 鍋島孝子:「地域研究方法論:理論批判と比較研究によりアフリカの特徴を抽出する」、『国際広報メディア・観光学ジャーナル』、2009年第1期、6頁。

③ 寺田貴:「アジア地域主義論—問題探求と分析方法」、寺田貴:『アジア学のすすめ 第一巻 アジア政治・経済論』、弘文堂、2010、125頁。

部分,没有对包含地区在内的全体(世界)进行规定之前,地区是无法规定的;地区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也就是说会处在一个产生、变化和消亡的动力之下;仅仅使用理解他者的视角已经无法阐释地区,研究者需要将自己置于他者的立场,来理解作为集体认同(我们)的地区等等。^①

最后,论争指向了地区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根据萨义德《东方主义》中关于叙述的阐发,到目前为止的地区研究,包括地区划分本身,是战后美国的需要,甚至是欧洲近代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种反思早期集中体现在上文提及的矢野畅教授的研究中,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酒井直树教授。酒井直指西方学术界存在一个长期潜藏在知识生产之下的预设,全球被分为“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西方生产理论,非西方生产经验,非西方只是作为西方的参数(index)存在,非西方学者也就是“本地经验的报道人”而已,非西方借由西方来生产自身,这种类似主奴间欲望的投射被称为“文明的移情”。^② 按照酒井直树的分析逻辑,地区研究中的“地区”并不是严格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构成,而是基于观念投射和成见形成的政治性概念。地区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只是指亚非拉这样的非西方地区,而对西欧、美国等发达地区的研究并不被视为地区研究。战后的地区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以知识生产的方式来建立现实政治秩序的实践行为,建立起了一整套欧裔西方主导的,以非西方国家为对象具有体系性的知识,成为战后欧美文化霸权构成的内在部分。^③

① 山影進:「地域統合 地域主義と地域研究」、坪内良博編:『総合的地域研究を求めて—東南アジア像を手がかりに』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9年、467—469頁。

② 酒井直树最新的日文研究资料参见:酒井直樹:「ボックス・アメリカナの終わり」、神奈川大学評論編集専門委員会編:『神奈川大学評論』(65)、2010年、32—45頁;酒井直樹、本橋哲也訳:「哲学と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文明的転移と「西洋(ウエスト)/その他(レスト)(the West and the Rest)」という言説」、『現代思想』39(18)、2011年、180—197頁;酒井直樹:「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な条件と日本研究の将来:「失われた二十年」と帝国の喪失」、『日本研究』(53)2016年、11—22頁。中文研究资料及报道参见〔日〕酒井直树、陈湘静:《亚洲抵抗的方式:亚洲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酒井直树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6期,第4—18頁;〔日〕酒井直树:《什么是亚洲·有关人类学差异》,杜可柯、董子云译,《天涯》2018年第4期,第4—17頁。

③ 酒井直树关于地区研究的见解更多体现在他的学术演讲中,中文演讲参见〔日〕酒井直树:《理论与亚洲人文:美国学界区域研究的未来》,2015年10月11—13日清华大学, https://www.tsinghua.edu.cn/publish/shss/1839/2015/20151016152415438126738/20151016152415438126738_.html, 2018-10-03;日文演讲参见酒井直樹:「地域研究の結末/目的:理論と国際性をめぐって」、2017年5月14日、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http://research.nichibun.ac.jp/region/d/EVT/symposium/s001/cal/2017/05/14/s001/en/pdf/article.pdf>, 2018-10-03;酒井直樹:「地域研究と近代国際世界——ボックス・アメリカナと人種主義を巡って」2017年12月9日、早稲田大学, <https://www.waseda.jp/flas/rilas/news/2017/11/30/3812/>, 2018-10-03。

以美国的日本研究为例,酒井直树与哈罗特尼安(Harry Harootunian)一起分析了美国区域研究(特别是东亚研究和日本研究)从形成到制度化发展的历史因素及其结构性缺陷,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度性地建立起对非西方的地区研究学科,向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建议,成为战后美国规划和建立世界霸权的有效资源。但由于地区研究课题申请制度、既有研究框架的固化、拒斥与他国、他文化的平等交流,导致了认知生产的重复性与认知发展能力的停滞、对非西方国家的族群和社会建构了陈旧刻板印象,无法回应巨变中的当下世界和提供有效的智力资源和决策建议,这是今天美国区域研究的核心困境。他们提出了通过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等文化研究,来为地区研究寻找曙光。^① 美国的地区研究当然与日本的地区研究不尽相同,文化研究是否可以代替地区研究也值得商榷,但酒井直树提出的很多地区研究背后的思考仍然非常有启发。

三、日本地区研究的新特点与意义

不可否认,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受到美国的重要影响,但还应该看到日本自身地区研究的历史传承。国分教授提及了战前在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及在中国东北成立的满铁调查部,虽然战后都被看作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情报机关被彻底否定和解散,但彼时形成的研究机制、调查方法还是对后世有所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如在战后曾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总长的矢内原忠雄教授,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印度经济的研究是日本战前地区研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② 基于战争期间地区研究曾为军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历史,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的地区研究都强调以史为鉴,只着眼于对地区本身进行科学研究。如1963年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之时,校长平泽兴教授曾忠告过的那样,“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政治性立场”。^③ 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的地区研究仍完全脱离政治是无法想象的,国家的需要、通过课题的设置

① H. ハルトゥーニアン、酒井直樹:「日本研究と文化研究」、『思想』通号 877、1997年、4—53頁。英文版本 Harry Harootunian and Naoki Sakai, “Jap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Positions* 7(2), 1999, pp. 593-647. 日文译本早于英文两年发表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英文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探讨。

② 伊澤裕二:「矢内原忠雄「インド工業論」の形成過程—戦前期日本における地域研究の方法について」、『立命館経済学』第64巻第2号、2015年、43—83頁。

③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国际政治学 第三卷 地区研究与国际政治》,第10页。

批准引导作用、委员会机制的广泛存在,以及学者直接参与国家对外关系途径的不断拓宽,引发了日本地区研究不可避免的变化。

从学术表现来看,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及主题,与国际、地区形势变化及日本国内政党更迭、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变化在无形之中越来越密切。以日本的亚洲共同体研究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变化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微妙联系。目前,能找到的战后日本第一篇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论文是在1957年发表,^①一直到2000年前的44年间,合计只有8篇文章涉及这一关键词。到2000年以后开始逐渐增多,呈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发展规律。(参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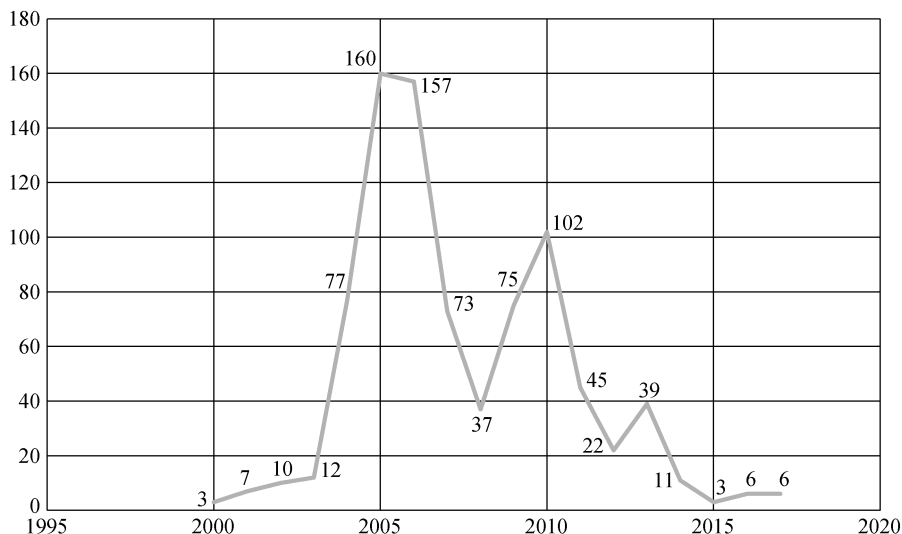


图 日本关于亚洲共同体研究发表论文数量变化趋势(2000—2017)

资料来源: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数据库内以“亚洲共同体”为主题词检索得到的结果。参见 <http://iss.ndl.go.jp/>, 2018-09-06。

关于亚洲共同体研究年度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出剧烈变化,其中有两个峰值,分别是2005年的160篇和2012年的102篇。从日本国内政治情况来看,2003年12月,小泉纯一郎在东盟首脑会议上以《东京宣言》的形式明确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此后2004年秋的联大演说及2005年初的众议院施政演说和年底的东亚首脑会议中,反复倡导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方针。2009年,倡导“友爱外交”和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上台,在联大峰会、新加坡、中国的人

① 原觉天:「アジア共同体の構想とその成否」『世界經濟評論』(通号 39) 1957年。

民大学等多次演讲中,再次倡导东亚共同体,认为是日本的第三次开国。当然,由于课题申请及论文撰写的相对滞后性,论文发表数量的峰值与日本政治家观点提出相比稍微滞后,但其内在的联系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日本从事地区研究学者很多都熟悉研究对象国家地区的语言,坚持长期做田野调查,因此,对相关地区有比较全面和真实的了解,也就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意见,甚至直接参与二轨外交的活动。日本外务省内就有很多这样的课题研究与组织结构,特别是专家座谈会这种制度,能够就某一地区的特定突出问题,征求各方面尤其是专家学者的意见,为政府最终外交决策提供帮助,地区研究学者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如外务省组织的“关于与拉美日裔社会之间联系专家座谈会”中,上智大学的堀坂浩太郎教授、庆应大学的柳田利夫教授、南山大学的浅香幸枝教授及筑波大学的浦野教授(Urano Edson Ioshiaqui)都是研究拉美地区的专家。^① 2018年7月27日外务省刚刚成立了“面向推进日韩文化人员交流专家座谈会”中,京都大学的小仓纪藏教授研究韩国哲学,静冈县立大学的小针进教授研究韩国社会,而庆应大学的西野纯也教授研究韩国政治,这样的专家组合可以为政府提供更完整的分析与判断。^② 除了在日本国家政策形成、执行阶段的参与外,很多学者参与了对具体政策评估和核查的相关工作。负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具体实施的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JICA),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合作。为接受项目评估等方面的建议,确保项目评估的问责制,提高评估质量,加强反馈等目的,成立了评估外部专家委员会。其中担任委员长的是京都大学的高桥基树教授,主攻非洲发展,尤其是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的研究;委员长代理是日本大学朽木昭文教授,主攻发展经济学,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研究;委员中的一桥大学黑崎卓教授,主攻亚洲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南亚经济的研究。^③ 国分良成教授本人同样从2008年开始担任公益财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评论员、理事,2012年开始担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从未来发展的趋势

① 参见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4582.html, 2018-10-02。

② 参见外务省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6286.html, 2018-10-02。

③ 参见国际协力机构网页:<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iinkai/committee.html>, 2018-10-02。

来看,日本地区研究学者与日本政治外交的互动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和深刻。

日本地区研究始终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论争,但这种论争的本质是如何更好发展地区研究,而不是要不要地区研究,正是在这种不断争论的过程中,迫使论争双方不断深入思考、不断完善日本的地区研究。其中一个典型的证明是,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带来了日本地区研究方法论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一批以探讨地区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和著作纷纷问世,其中既有大东文化大学的加藤普章教授、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立本成文教授等对地区研究从总体上梳理基本概念、研究历史与研究方法的成果;^①也有在从事地区研究时具体研究手段的介绍与总结,如一桥大学的佐藤郁哉教授关于田野调查的著作深受年轻一代的欢迎;^②还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稻贺繁美教授、天理大学的住原则也教授等人对从事地区研究必备的一些基本能力如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描述等思考也很深刻。^③从日本学术振兴会到日本各大地区研究机构,重视具体地区研究领域进展的同时,也注意推动地区研究学科本身的完善和发展,把吸引、鼓励、培养年轻一代的地区研究者作为战略性举措来进行,在课题申请、联合培养、增加田野调查机会等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制度与举措。

国分良成在书中曾提及,日本的地区研究究竟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强化做出多大贡献仍待商榷,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回答。日本大学浦野起央教授认为,“如果把地区研究视为横轴的话,其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纵轴交叉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定的空间维度,来确定各个独立研究所属的领域。这里的国际关系,意味着面对作为权力政治的国际政治学这样的政策科学,来综合运用地理、人口、历史、价值观、社会、经济、资源、战略、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的分析方法。这里立足地区研究的地区维度设定,就发挥了关键的分析作用。同时,对于国际政治的分析与决策,地区研究能够承担起

① 加藤普章编『新版 エリア・スタディ入門:地域研究の学び方』昭和堂、2000年;立本成文『地域研究の問題と方法:社会文化生態力学の試み(増補改訂)』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年;近藤孝弘、中矢礼美、西野節男編著『地域研究:多様性の教育学へ』東信堂、2018年。

② 佐藤郁哉『フィールドワーク:書を持って街へ出よう(増訂版)』新曜社、2007年。

③ 稻贺繁美編:『異文化理解の倫理にむけて』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住原则也、箭内匡、芹澤知広『異文化の学び方・描き方:なぜ、どのように研究するのか』世界思想社、2001年。

从内容上补充国际关系分析的重要使命。”^①目前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与教学领域里,基本上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地区研究关系的共识,在普通的日本国际政治学的教科书中是这样引导年轻学子,“如果可能的话,对稍微不同的多个领域感兴趣是最理想的:理论(研究)与地区(研究)、理论(研究)与具体的功能性领域(研究)等等,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把这样两个点,或者三个点连缀起来,就可以增加对国际政治学的理解”。^②即便从系统资料整理、更多个案积累、提供理论检验等角度来说,地区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也是不可或缺的。或许这样才能理解该书编排的考量:既有对全球范围内各地区研究的总结,也包括民族主义、武装冲突、伊斯兰与宗教等功能性领域的研究概述。

日本的地区研究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在一段时间内也饱受质疑。日益超越主权国家研究本位的全球化发展日新月异,地区研究是否会一蹶不振呢?1996年担任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APSA)主席、哈佛大学的罗伯特·H·贝茨(Robert H. Bates)教授曾针对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专业研究之间“以对抗的方式进行论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地区研究学者倾向于关注独特现象的努力使长期希望寻求更广泛的规律以推动社会研究科学化的学者们深感沮丧,但超越科学与人文的二分是未来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政治学领域新近兴起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可以用来探索历史塑造政治信仰的方式和主观信仰影响选择和行为的方式”;“基于扩展形博弈论创建分析性叙事的努力,保证了通过严谨方法在研究独特事件方面取得进步”。^③地区研究究竟是要走“量化研究”?还是要走“跨地域”研究、“跨知识领域”研究?是固守在传统的国别研究,还是积极放眼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冲突、环境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④地区研究如果希望能够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发挥其对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的反思性、分析性和整合性的矫正作用,那么,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地区研究者都必须进行深入思考和慎重选择。

① 浦野起央:『日本の国際認識:地域研究250年 認識・論争・成果年譜』三和書籍、2018年、138頁。

② 村田晃嗣、君塚直隆、石川卓、栗栖薫子、秋山信将:『国際政治をつかむ』有斐閣、2009年、292頁。

③ Robert H. Bates,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Newsletter of the APSA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7, No.1, 1996, p. 1; 贝茨对此地区研究发展走向的更全面思考,参见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0, No.2, 1997, pp. 166-169.

④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 eds.,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341.